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基于8省16县微观数据的分析

汪三贵^{a,b}, 张东晟^a

(中国人民大学 a.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b. 中国扶贫研究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破解贫困地区生存困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大空间干预战略。本文基于8省16县1 063户农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 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实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该效应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机制检验发现, 教育及医疗服务可及性改善是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 搬迁政策对60岁以下户主家庭、无大病成员家庭及高耕地禀赋家庭的促进效应更强, 但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据此, 建议健全常态化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警机制, 实施差异化精准扶持, 持续优化安置区公共服务供给,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农户; 内生发展能力; 常态化帮扶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5-0030-11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ts mechanisms—An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16 counties across 8 provinces

WANG Sangui^{a,b}, ZHANG Dongsheng^a

(a.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b. China Anti-Poverty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s a major spati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survival dilemmas in impoverished areas and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ased on three-period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1 063 farm households from 16 counties across 8 provinc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this effect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over time.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improv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serves as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ouseholds with heads under 60 years of age, households without members suffering from major illnesses,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er cultivated land endowments. Overall, the relocation policy demonstrates favorable universality and inclusivenes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normalized categorized assessment and dynamic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support,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resettlement areas, so a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normalized support

收稿日期: 2026-06-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72442020)

作者简介: 汪三贵(1962—), 男, 湖南临澧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与农村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三五”期间,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全面展开。

作为精准扶贫时期“五个一批”工程的核心举措,易地扶贫搬迁是破解“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发展困境的重大空间干预战略。该政策通过将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至适宜发展地区,不仅实现了960多万贫困人口的空间跨越与脱贫摘帽,也重构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与发展环境。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易地扶贫搬迁为搬迁农户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提升内生发展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易地扶贫搬迁具有迁出地推力主导、城镇化集中安置、生产方式非农化等重要特征^[1]。在政策成效上,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增长^[2-6],对家庭消费、就业以及缓解多维贫困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7-10],并且城镇安置相较于农村安置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11,12]。然而,搬迁任务的完成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实现了搬迁群众“搬得出”,还要努力实现“稳得住、能致富”^[13]。当前,我国帮扶工作已进入由“政策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转型的关键节点,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难以支撑搬迁农户的可持续发展。已有研究发现,大型集中安置区虽已基本实现稳定脱贫,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仍面临配套产业竞争力不强、劳动力素质与生计模式转型要求不匹配、搬迁群众身份重构缓慢等障碍^[14]，“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的共存困境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成为一个动态且复杂的长期过程^[15,16]。与此同时,农户生产生活场域的转变还伴随着生计方式调整、社会网络重构和心理适应等多重挑战^[17-19],部分搬迁农户在新场域融入过程中可能面临可行能力不足与发展意识薄弱等发展壁垒^[20],其内生发展能力还会受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实效认知、政府支持方式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影响^[21]。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多重挑战、推动搬迁农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后扶贫时代的重要课题^[22-24]。

激发并提升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推动其由“被动输血”向“内生造血”实质性转变,是破解上述困境的根本之策。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是指农户基于自身生计需求,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主动追求发展、提升能力并付诸实践的内在驱动力量。关于内生发展能力的理论认识,呈现出一个从引介西方理

论到构建本土化解释框架的演进过程。早期研究多从心理学与管理学视域展开:自我决定理论指出,自主、胜任与归属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促进个体内在动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25];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揭示了主观发展动机随需求层次跃升的演变规律^[26];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则将贫困理解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强调发展的实质在于扩展个体实现其所珍视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27]。在中国贫困治理语境下,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具象化和本土化,它突出强调农户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发展意识,是“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重要体现^[28-30]。在内生发展能力的实证测度方面,现有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类思路:一类研究从内生发展能力的某一核心表现出发,选取主观认知^[31]、发展信心^[32]、福利依赖^[33]等指标进行代理测度,强调个体心理特征和主观行为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另一类研究则更加重视内生发展能力的多维属性,将主观发展意愿与客观发展能力共同纳入分析框架^[34-37],尝试通过多维指标体系刻画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综合反映农户自主发展的现实基础与行动倾向。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搬迁后的收入增长、社会适应、生计转型等方面,并普遍认为后续扶持政策、社会支持与主体发展意愿等是影响搬迁农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其一,基于大规模微观主体的实证检验仍相对不足。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宏观安置区或个别地区的内生发展现状,以案例分析或定性讨论为主,对作为内生发展能力核心载体的微观农户关注不足,刻画搬迁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动态变化的经验证据仍较为有限。其二,政策效应的因果逻辑链条尚不完整。一方面,鲜有研究将易地扶贫搬迁视作一项重大外生冲击,以精确识别其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因果净效应。另一方面,政策传导的“过程黑箱”亟待打开,多数研究仅关注搬迁政策带来的物质性结果,对作用机制的探讨也多停留在定性层面,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影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仍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全国8省16县1063户样本

农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评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以期评估搬迁政策长期成效、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直接影响

易地搬迁既不是简单的地域变动,也不是简单的人群拼凑,而是身份重塑、情感融入和生活方式根本变革,这就决定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成效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根据需求层次理论^[26],个体需求遵循从生理、安全向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逐级递进的逻辑。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农户长期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其在原居住地难以保障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得以满足,为其内生发展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搬迁前,部分贫困农户长期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市场联系不足的地区,家庭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受到较强的空间约束。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改变居住区位,改善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使农户能够更加便利地接触市场和公共服务资源,从而降低地理隔离对生产、生活和要素配置形成的限制,拓展家庭进行劳动力配置、人力资本投资和生计调整的空间,进而扩大农户的发展机会集合,为家庭将既有资源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25],更为丰富的发展机会以及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积极反馈,有助于增强搬迁农户的自主感和胜任感,进而促进自主性发展动机的形成。长期处于生存压力和发展机会匮乏状态的农户,往往需要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维持基本生活,对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和投入受到约束。易地扶贫搬迁在改善基本生活条件、降低生存压力的基础上,使农户拥有更多资源和空间关注就业、教育投入、能力提升及社会参与等自主性与发展性目标,促进农户由依赖外部支持向主动利用资源、谋求持续发展转变,进而提升其内生发展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₁: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

(二)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间接影响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27]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发展的核心在于扩展人们过上自己所珍视生活的自由。从这一视角看,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并非单纯取决于家庭拥有多少外部资源,更取决于其能否将既有资源和外部发展机会转化为人力资本、健康资本以及持续改善生活的现实能力。教育和健康既是个体实现有价值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其参与劳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利用其他发展机会的重要基础。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教育服务可及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方面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

首先,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拓展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可行能力。一方面,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户而言,基础教育设施距离较远会增加家庭获取教育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并可能加剧地理条件对教育机会的约束。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改变农户的居住区位,使其更加接近基础教育设施,从而减少教育服务获取过程中的空间障碍。另一方面,虽然部分搬迁户子女教育在过渡期内可能面临家庭支持与学校引导脱节的困境^[38],但从长期来看,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改善能够为家庭成员持续接受教育和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更有利的外部条件,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将进一步提高搬迁家庭获取信息、学习技能、参与就业、适应市场变化等长期发展能力和代际发展潜力,从而增强农户依靠自身能力谋求持续发展的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_{2a}: 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通过提升教育服务可及性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其次,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拓展家庭维持健康和开展生产活动的可行能力,降低健康风险对内生发展能力的侵蚀。健康是个体参与劳动、获取收入并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对于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且居住分散的贫困农户而言,较高的就医距离会强化疾病冲击对家庭劳动供给和发展投入的约束。易地扶贫搬迁使农户更加接近基本医疗服务设施,有助于降低医疗服务获取的空间成本,提高家庭获得基本诊疗服务的便利程度,缓解疾病对家庭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并减少健康冲

击对教育投资、生产经营和其他发展性投入的挤出，由此增强农户利用现有资源和外部机会实现持续发展的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_{2b}：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通过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依赖的微观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原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机构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追踪调查。该大型调研项目自2016年基期启动以来，先后于2017年、2019年及2021年进行了多轮次的回访与跟进。问卷设计多维且翔实，涵盖了安置区、行政村、搬迁农户以及部分非搬迁户等多个层面的微观信息，调研区域涵盖中西部腹地的八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与甘肃。这一区域设定的核心逻辑在于，上述八省（区）均系《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任务最重的主阵地，其计划搬迁规模皆突破了50万人大关。同时，这些区域的生态与地理环境相对脆弱，横跨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等五个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而言，样本不仅地理覆盖面广，还囊括了现有的各类搬迁模式及不同规模的安置区，为研究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数据支撑。

本文选取2017年、2019年和2021年三期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层面的面板数据。调查期间，样本中接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农户数量逐步增加，不同农户接受搬迁政策的时间存在差异，为后续政策效应识别提供了数据基础。在剔除无效样本、缺失样本以及未追踪到的样本后，最终得到1 063户农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共3 189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既体现家庭在资源禀赋、要素配置和发展策略等方面所具备的现实能力，也体现家庭主动改善生活、谋求持续发展的主观意愿。基于李飞^[34]、刘亭廷^[37]、石智雷^[39]等人的相关研究，本文从家庭客观发展能力和家庭主观发展意愿两个维度构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表1），采用熵值法计算最终得分。

表1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指标属性
家庭客观发展能力	家庭资源禀赋	家庭人均资产(元)	家庭耐用消费品总值/家庭人口数	正向
		家庭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人口数	正向
		社会资本	亲戚朋友中的公职人数	正向
	家庭发展策略	家庭劳动投入强度	家庭劳动总时间/家庭劳动人口数	正向
		家庭收入多样性	采用Shannon-Weaver公式计算	正向
		家庭教育投资(元)	家庭教育支出	正向
家庭主观发展意愿	社会认知	基层治理参与意愿	家庭参与村公共事务讨论程度	正向
		基层治理影响力	家庭对村公共事务影响力程度	正向
	自我认知	家庭生活满意度	对实际生活的满意程度	正向
		家庭发展进取倾向	与其他人相比的闯劲程度	正向

家庭客观发展能力是指农户依托既有资源禀赋并通过合理配置家庭生活要素形成的现实发展基础，主要反映家庭“有没有能力实现持续发展”，具体包括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发展策略两个方面。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家庭客观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不仅决定了家庭成员在资源获取、能力培养和社会流动中的起点，也是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家庭发展策略反映了农户在既有资源约束下对劳动力分配、收入获取、风险应对等方面采取的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应对措施，是家庭将资源禀

赋转化为现实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参考石智雷^[39]的相关研究，以家庭人均资产、家庭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本衡量家庭资源禀赋，以家庭劳动投入强度、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资衡量家庭发展策略，并使用Shannon-Weaver公式计算家庭收入多样性。

家庭主观发展意愿是农户基于自身期望与外部环境，主动追求生活改善、实现向上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是衡量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关键维度，直接回应了家庭“想不想发展”“有

多大动力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家庭主观发展意愿划分为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两个方面。社会认知主要反映农户对自身与村庄公共事务关系的认识，及其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程度，以基层治理参与意愿和基层治理影响力衡量。其中，基层治理参与意愿和基层治理影响力分别通过农户对“是否参与村内公共事务讨论”和“家庭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影响力”的自评衡量。自我认知主要反映农户对当前生活状态和自身未来发展倾向的主观判断，具体以家庭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发展进取倾向两个指标度量。家庭生活满意度通过农户对“实际生活的满意程度”的自评衡量，家庭发展进取倾向则通过农户对“与其他人相比的闯劲程度”的自评来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易地扶贫搬迁，基于问卷中农户“是否有人入住新家”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在2017—2021年观测期间，若农户在*t*年已有家庭成员入住新家，则视为该农户已发生易地搬迁，将其搬迁当年及后续年份赋值为1，纳入实验组。若尚未搬迁入住则赋值为0，纳入控制组。这种分

批次处理结构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利用搬迁时点差异识别政策效应提供了基础。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11,40]，本文选取户主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居家时间、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干部这六个指标作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选取家庭男性占比、家庭党员数量、金融可获得性这三个指标作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4. 机制变量

本文选用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可及性作为机制变量。教育服务可及性使用农户家庭距最近小学的距离予以衡量，医疗服务可及性使用农户家庭距最近诊所的距离予以衡量。

5. 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赋值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是涵盖农户家庭客观发展能力与主观发展意愿的综合指标，其均值0.147处于较低水平且最大值仅为0.405，反映了样本农户在搬迁初期面临“底子薄”的客观现实，为后续观察搬迁政策带来的边际提升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构建指标体系测算	0.147	0.0517	0.00421	0.405
解释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	是否有人入住新家，是=1，否=0	0.725	0.446	0	1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岁	55.94	11.67	21	92
	户主性别	男=1，女=0	0.927	0.260	0	1
	户主健康状况	健康=1，不健康=0	0.559	0.497	0	1
	户主居家时间	户主全年在家居住多长时间/月	10.55	3.264	0	12
	户主受教育程度	没上学=0，小学一至六年级=1~6，初一至初三=7~9，高一至高三=10~12，职业高中=12，中专=12，大专及以上=15	4.990	3.342	0	15
	户主是否干部	是=1，否=0	0.0395	0.195	0	1
	家庭男性占比	家庭男性人数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0.535	0.173	0	1
	家庭党员数量	家庭党员数量/人	0.102	0.381	0	7
	金融可获得性	距离最近的乡镇有多少家金融机构	1.995	1.728	0	20
	教育服务可及性	农户家庭距最近小学的距离/千米	4.753	6.429	0	50
机制变量	医疗服务可及性	农户家庭距最近诊所的距离/千米	2.559	4.042	0	35

(三)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具有渐进性，本文选用多期双重差分法（Multi-period DID）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ed_{i,t} + \beta_i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Y_{i,t}$ 表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数， $Treated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X_{i,t}$ 为影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组， β_0 为截距项， β_1 和 β_i 分别为是否搬迁和控制变量组的回归系数， μ_i 表示

农户固定效应， δ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参考江艇^[41]的研究，本文采用二阶段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教育服务可及性以及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验证政策发挥效用的潜在渠道。具体模型如下：

$$MED_{i,t} = \partial_0 + \partial_1 Treated_{i,t} + \partial_i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 $MED_{i,t}$ 为中介变量，包括教育服务可及性以及医疗服务可及性，其余变量定义与基

准回归模型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显示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2)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3)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	0.013*** (0.003)	0.013*** (0.003)	0.013*** (0.003)
户主年龄		0.000* (0.000)	0.000* (0.000)
户主性别		-0.002 (0.007)	-0.003 (0.007)
户主健康状况		0.005* (0.002)	0.005* (0.002)
户主居家时间		-0.001** (0.000)	-0.001**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1*** (0.000)	0.001*** (0.000)
户主是否干部		0.012* (0.006)	0.011* (0.006)
家庭男性占比			0.017 (0.014)
家庭党员数量			0.006* (0.003)
金融可获得性			0.000 (0.001)
常数项	0.122*** (0.001)	0.105*** (0.012)	0.095*** (0.01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189	3 189	3 189
家庭数	1 063	1 063	1 063
组内R ²	0.240	0.249	0.25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p < 0.10$, $p < 0.05$, $p < 0.01$ ，以下同。

列（1）—列（3）分别表示了不包含控制变量和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控制了年份和家户固定效应下的全样本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增强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H₁得到验证。具体来看，列（3）中易地扶贫搬迁的回归系数为0.01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考虑到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数的均值为 0.147，0.013的系数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使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相对于平均水平提升了约 8.8%。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作为一种“慢变量”，其

改变通常具有滞后性，约8.8%的相对增幅在3~5年的政策观察期内已属于显著提升。这证明了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实现了物理空间的位移，更在微观层面触动了农户的发展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图1和表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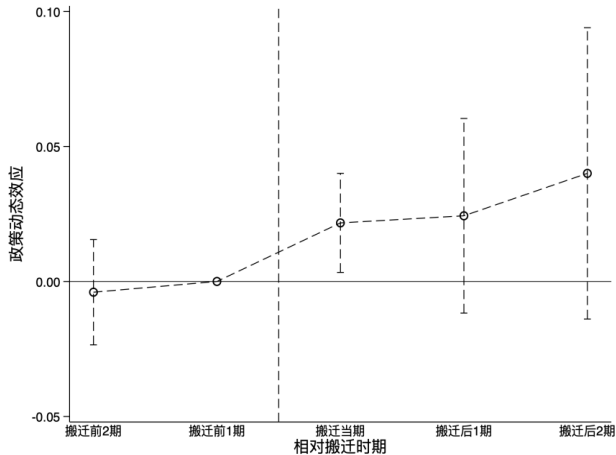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为确保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对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以搬迁前1期作为基准期，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搬迁前2期的估计系数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说明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检验结果支持平行趋势假设。进一步考察政策的动态效应可以发现，搬迁当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会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从后续时期的点估计来看，搬迁后1期和搬迁后2期的政策效应均保持为正，且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逐步增强特征。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含义是农户拥有独立自主、主动作为的发展能力，本文在家庭收入多样性指标测算中删去转移性收入来源，并重新测算内生发展能力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4列（1）所示，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剥离转移性收入的政策“输血”效应后，易地扶贫

搬迁依然有效激发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证实了基准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 极端值敏感性检验

表4列（2）报告了极端值缩尾处理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与户主年龄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排除异常观测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易地扶贫搬迁的系数仍为0.01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均保持一致，表明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对极端值并不敏感，原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删去转移性收入	缩尾处理
易地扶贫搬迁	0.013*** (0.003)	0.013*** (0.003)
户主年龄	0.000 (0.000)	
户主性别	-0.004 (0.007)	-0.002 (0.006)
户主健康状况	0.005* (0.002)	0.005* (0.002)
户主居家时间	-0.001**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2*** (0.001)	0.001*** (0.000)
户主是否干部	0.011* (0.006)	0.011* (0.006)
家庭男性占比	0.017 (0.015)	0.017 (0.014)
家庭党员数量	0.005 (0.004)	0.005* (0.003)
金融可获得性	0.000 (0.001)	
户主年龄(缩尾)		0.000* (0.000)
户主居家时间(缩尾)		-0.001** (0.000)
金融可获得性(缩尾)		0.000 (0.001)
常数项	0.103*** (0.014)	0.096*** (0.01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 189	3 189
家庭数	1 063	1 063
组内R ²	0.251	0.254

4.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随机因素或样本偶然性的干扰，本文采用随机置换方法进

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具体而言，本文在家庭层面随机置换搬迁年份，在保持各搬迁批次样本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重新构造虚假政策处理变量，并重复进行500次回归，得到随机处理条件下DID估计系数的经验分布。结果显示，随机置换所得估计系数主要集中于0附近，整体呈近似对称分布；相比之下，基准回归的真实DID估计系数约为0.013，明显偏离随机估计系数分布的中心区域。这表明，在随机分配搬迁年份的情况下，较难获得与基准回归相近的正向估计结果，基准回归所识别出的政策效应并非由随机处理或样本偶然性所驱动。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提升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研究结论，基准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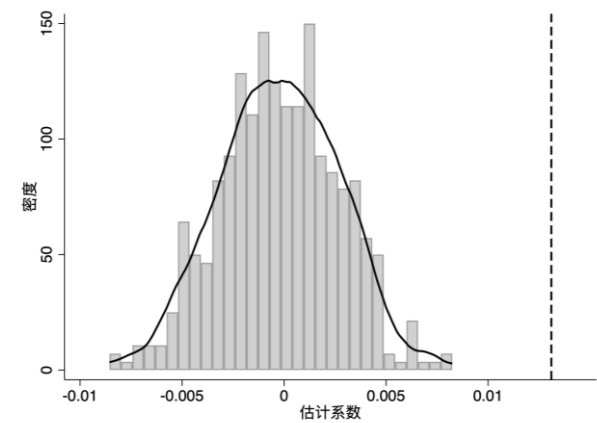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三）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影响的群体差异，本文从户主个体特征、家庭健康负担和家庭耕地禀赋三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检验。

1. 户主个体特征异质性

户主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供给、就业转换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此，本文选取户主年龄作为户主个体特征异质性的度量指标，以60岁为界限进行了分组检验。如表5列（1）和列（2）所示，易地扶贫搬迁对两类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60岁以下组的估计系数为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60岁及以上组的估计系数为0.012，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横向比较可见，60岁以下户主家庭的政策效应更高。从生理适应能力与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看，相较于

年轻户主家庭，高龄户主家庭在搬迁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心理适应成本与生计转型压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相对不足，使得其将搬迁安置资源转化为自身发展能力的效率相对较低。这一发现提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应高度关注老龄化家庭的特殊性，可通过开发“家门口”的公益性岗位或强化社会保障兜底等方式，进一步缓解其生计适应难题。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60岁以下	(2) 60岁及以上	(3) 无大病成员	(4) 有大病成员	(5) 低耕地禀赋	(6) 高耕地禀赋
易地扶贫搬迁	0.014*** (0.003)	0.012** (0.005)	0.014*** (0.003)	0.013* (0.008)	0.011** (0.004)	0.014***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992	1 197	2 742	447	1 584	1 605
家庭数	664	399	914	149	528	535
组内R ²	0.274	0.223	0.247	0.288	0.242	0.269

2. 家庭健康负担异质性

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劳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家庭中存在大病成员时，不仅会增加医疗支出，还可能通过减少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照护时间以及挤出生计投入等方式形成持续约束。因此，家庭健康负担可能影响搬迁所带来的外部发展条件向家庭自身发展能力转化的程度。本文依据2017年调查中家庭是否存在大病成员，将样本划分为无大病成员组和有大病成员组进行检验。表5列（3）和列（4）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无大病成员组和有大病成员组的内生发展能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无大病成员组的估计系数为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有大病成员组的估计系数为0.013，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系数大小看，两组政策效应较为接近，但无大病负担家庭的估计结果表现出更高的统计精度。这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总体能够改善不同健康状况家庭的发展能力，体现出对不同家庭情况的农户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但对于面临较强健康约束的家庭而言，疾病支出、照护负担和劳动力损失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将搬迁改善的外部条件转化为持续发展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有大病成员组样本量相对较小，共149户，因此针对家庭健康负担的异质性结论更多提供了一种趋势性参考，未来仍需依赖更大规模的专门抽样调查予以验证。

3. 家庭耕地禀赋异质性

土地是农户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生计资本，其丰缺程度往往决定了农户对农业生计的依赖程度，不同耕地禀赋家庭在搬迁后可能采取不同的发展

路径。为了考察初始土地资源禀赋是否会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以2017年“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耕地禀赋组与低耕地禀赋组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列（5）和列（6）所示，易地扶贫搬迁对两类样本的内生发展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低耕地禀赋组的估计系数为0.011，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高耕地禀赋组的估计系数为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点估计结果看，高耕地禀赋组的政策效应相对更大，但与此同时，低耕地禀赋组同样获得了显著的能力提升，说明搬迁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并未局限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农户，而是对不同土地资源禀赋家庭均具有积极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并非简单的物理位移，其配套的土地流转制度与后续帮扶措施发挥了关键的“平滑”作用^[42]。一方面，对于低耕地禀赋农户，搬迁直接打破了其土地资源的匮乏束缚，促成了其生计向非农领域的快速转型；另一方面，对于高耕地禀赋农户，政策通过积极引导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入股农业合作社等手段，成功将搬迁农户原本的土地权益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资本收益，从而有效对冲和弥合了由土地禀赋差异带来的生计转型鸿沟。

综上所述，搬迁政策在激发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方面呈现出“群体差异”与“包容普惠”并存的特征。一方面，搬迁政策成功跨越了由个体特征、家庭健康负担与耕地资源禀赋等差距所带来的鸿沟，实现了“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宏观目标；但另一方面，在应对高龄搬迁群体与家庭健康负担较重

的农户家庭方面，仍呈现出一定的客观局限。这不仅印证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上的公平性，也为后续常态化帮扶阶段防范规模性返贫、精准分类帮扶老龄弱势群体、完善农村大病重病政策等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着力点与坚实的实证依据。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打开搬迁政策影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机制“黑箱”，本文从教育服务可及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

表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教育服务可及性	医疗服务可及性
易地扶贫搬迁	-3.538*** (0.340)	-2.660*** (0.237)
户主年龄	-0.009 (0.023)	0.013 (0.015)
户主性别	0.492 (0.522)	-0.088 (0.365)
户主健康状况	-0.090 (0.261)	-0.274 (0.198)
户主居家时间	0.010 (0.038)	0.006 (0.025)
户主受教育程度	-0.146** (0.060)	-0.003 (0.043)
户主是否干部	1.087 (0.843)	-0.125 (0.633)
家庭男性占比	1.983 (1.732)	0.167 (0.958)
家庭党员数量	0.009 (0.304)	0.177 (0.131)
金融可获得性	0.021 (0.070)	-0.078** (0.039)
常数项	6.599*** (1.686)	4.419*** (1.01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189	3189
家庭数	1063	1063
组内R ²	0.112	0.173

1. 教育服务可及性机制

为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是否通过改善教育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本文以农户家庭搬迁前后至最近小学的距离衡量教育服务可及性，该指标数值越小，表明家庭获取基础教育服务的空间距离越短，教育服务可及性越高。表6列（1）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3.538，且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搬迁后农户家庭至最近小学的距离平均缩短3.538千米。这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获取基础教育服务的空间成本，改善了家庭接触基础教育设施的便利条件。结合前文理论分析，这种空间可及性的改善，有利于为家庭持续接受教育及积累人力资本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撑。因此，H_{2a}得到验证。

2. 医疗服务可及性机制

进一步地，本文以农户家庭至最近诊所的距离衡量医疗服务可及性。同样，该指标数值越小，表示家庭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面临的空间约束越弱，医疗服务可及性越高。表6列（2）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2.660，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搬迁后农户家庭至最近诊所的距离平均缩短2.660千米。该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显著改善了农户获取基本医疗服务的空间条件，降低了医疗服务利用过程中由地理距离造成的障碍。结合前文分析，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健康风险对家庭劳动能力和长期发展投入形成的约束，进而为农户持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创造更加稳定的健康基础。因此，H_{2b}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8省16县样本农户的三期微观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使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约8.8%，政策效应从搬迁当期的初步显现到持续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与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是重要传导渠道，搬迁通过优化家庭获取教育及医疗服务的空间条件，为外部机会向内生能力转化提供支撑。异质性分析表明，搬迁政策对60岁以下户主家庭、无大病成员家庭和高耕地禀赋家庭的促进效应更强，但同时对不同年龄阶段、健康负担和耕地禀赋的农户家庭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未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分化，表明政策效应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包容性。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居住环境的物理位移，更是农户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摆脱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只是政策的初阶目标，而激发搬迁农户内生发

展能力,使其具备自发改御生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领,才是政策的终极导向。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应健全常态化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实证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带来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实质性跃升,且政策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间存在一定差异。据此,后续帮扶不应仅以单一的收入绝对值指标为导向,建议将本研究构建的“内生发展能力指数”相关维度补充纳入现有防止返贫的监测体系,健全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对收入暂时稳定但劳动力弱化、健康负担加重或发展投入不足的家庭进行持续跟踪。通过走访调研和定期评估等方式,及时识别农户家庭发展能力下降的风险,将政策介入由返贫后的补偿性救助进一步向风险形成前的预防性支持延伸,提高后续帮扶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二是应基于农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与精准化的后续扶持。异质性分析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不同家庭利用搬迁后发展机会的能力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后续扶持应在普惠性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分类施策水平。建议利用基层网格化数据对不同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画像”,进行分类干预:对因老龄化等客观原因导致生计资本薄弱、内生发展能力指标显著落后的农户家庭,强化社会保障兜底与开发轻体力公益性岗位;对于存在大病成员、医疗支出和照护压力较大的家庭,应加强基本医疗保障、健康管理和临时救助之间的衔接,尽量减少疾病冲击对劳动供给和家庭发展性支出的挤出;对于不同耕地禀赋家庭,则应根据其生产性资源基础提供差异化的发展条件,引导耕地较少的家庭更加顺畅地参与非农就业,同时完善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耕地资源较多的家庭在农业经营与非农就业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创造条件;对具备劳动力但自我发展意愿不足的农户,强化内生发展意愿和加强发展引导等,从而推动后续扶持从普遍覆盖转向“精准滴灌”,确保常态化帮扶政策精准发力。

三是应持续提升搬迁安置区教育服务可及性和衔接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改善是促进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后续政策应在已有安置区教育设施布局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搬迁家庭实际获得基础教育服务的便利程度,避免将公共服务改善简单等同于设施数量增

加。一方面,应结合安置区人口规模、学龄人口变化和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学校及相关教育服务设施布局,完善安置社区与学校之间的交通衔接,降低搬迁家庭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另一方面,应重视搬迁家庭子女进入新教育环境后的适应问题,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信息沟通,对教育支持能力较弱的家庭提供必要的课后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使空间距离缩短转化为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条件,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利用。

四是应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提升搬迁农户医疗服务便利性。研究发现,改善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有助于缓解健康因素对家庭持续发展的约束。因此,在后续扶持中,应继续把基本医疗服务的便捷获取作为搬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应根据搬迁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慢性病等健康需求,合理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设施布局,提高常见病、慢性病以及基本健康管理服务的就近可获得性;对于大病成员较多、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搬迁家庭,应加强家庭医生、慢性病随访、医保结算和转诊服务之间的衔接,降低反复就医产生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应通过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便利性,减少疾病冲击对家庭劳动力参与和教育、生产等发展性投入的挤压,使医疗可及性的改善进一步转化为家庭健康资本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12): 88-102.
- [2] 罗媛月, 张会萍, 肖人瑞.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宁夏947个搬迁移民的调研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10): 18-24.
- [3] 尹俊, 孙博文, 刘冲, 等.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J]. 经济科学, 2023(3): 185-204.
- [4] 曾旭晖. 易地扶贫搬迁的增收效应评估——基于四川省凉山彝区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25(1): 143-151.
- [5] 汪磊, 张薇薇, 汪霞. 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收入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4(3): 81-91.
- [6] Zhang L, Xie L Y, Zheng X Y. Across a few prohibitive miles: The impact of the Anti-Poverty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0: 102945.
- [7]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消费的影响[J]. 中

- 国人口科学, 2023, 37(6): 111-126.
- [8] 何蕾, 赵利梅, 蓝红星. 易地搬迁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6(1): 101-113.
- [9] Liu M Y, Feng X L, Zhao Y F,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9: 35-44.
- [10] 侯学博, 李现康, 张蚌蚌.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基于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857户家庭7期追踪数据的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4): 978-996.
- [11] 汪三贵, 马兰, 孙俊娜.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0): 67-85.
- [12] 徐家鹏, 李一琛, 闫振宇, 等. 易地扶贫搬迁中城镇集中安置模式的稳定脱贫效应研究——基于城乡安置模式对比的准自然实验[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12): 3463-3486.
- [13] 汪三贵, 钟宇, 张艳姣. 住宅类型、居住空间与搬迁家庭社区融入——基于8省16县微观数据的分析[J]. 农村经济, 2024(5): 99-109.
- [14] Guo H, Rogers S, Li J, et al. Farmers to urban citizens? Understanding resettled households' adaptation to urban life in Shaanxi, China[J]. Cities, 2024, 145: 104667.
- [15] 李雪, 张克俊. 易地扶贫搬迁大型集中安置区从巩固搬迁成果向融入新型城镇化转型研究[J]. 农村经济, 2025(6): 115-123.
- [16] 陈绍军, 唐滢.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及反思[J]. 农村经济, 2024(3): 75-90.
- [17] 王兆林, 王洁仪. 易地扶贫搬迁户返贫风险因素识别及防范策略——基于武陵山区典型项目区的调查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 (3): 166-179.
- [18] 刘升. 养老型返迁: 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困境及养老选择——基于某脱贫县集中安置社区的跟踪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119-129.
- [19] 李骥龙. 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变化——基于湘西自治州5个安置点的跟踪调查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66-176.
- [20] 宁德鹏, 何玲玲.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8): 109-117.
- [21] 葛晓军, 宋吉东. 脱贫成果巩固实效认知、政府与社会支持对移民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移民的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1): 9-16.
- [22] 尹宁, 郭思雨, 汪三贵. 推进以内生发展动力为导向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策略[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153-165, 208.
- [23] 田鹏. 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搬迁人地关系的实践逻辑及反思[J]. 农村经济, 2023(10): 61-72.
- [24] 杨慧.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4): 59-68.
- [25]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 [26]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4): 370-396.
- [27]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 [28] 王卓, 董贝贝. 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与运行逻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4): 110-117.
- [29] 汪三贵, 黄奕杰, 马兰. 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治理实践与巩固拓展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5-15, 205.
- [30] 李飞, 杨雯渊, 吴国宝. “工作换福利”与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基于乡村公益性岗位政策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2): 126-146.
- [31] 熊芳, 周文定, 韩纪江. 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吗? ——基于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J]. 财经论丛, 2024(3): 36-46.
- [32] 陈杰, 卢洁玉, 朱红根. 内生动力对城乡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智”与“志”的分析[J]. 财贸研究, 2023, 34 (6): 21-30.
- [33] 王明哲, 周迪, 黄炜. 扶贫先扶志——脱贫家庭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J]. 世界经济文汇, 2022(5): 1-18.
- [34] 李飞, 李欣玥, 肖志芳, 等. 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基于帮扶车间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2): 146-167.
- [35] 李彬, 杜唯, 张舰, 等. 合作社参与可否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基于宕昌县的调查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5, 45 (11): 105-126.
- [36] 孟维福, 侯恒宇, 吴琦. “输血”还是“造血”: 特色农业政策能否提升农村居民内生发展能力[J]. 财经问题研究, 2025(10): 91-104.
- [37] 刘亭廷, 温涛. 数字金融能够提升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吗[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6, 48 (5): 39-51.
- [38] 周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移民子女的学习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调查[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46-56.
- [39] 石智雷.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11(4): 83-94, 115.
- [40]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4): 101-120.
- [4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42] Lei X Y, Kong X W, Qiu H G, et al. Cropland use consequences of a nationwid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J]. Food Policy, 2026, 142: 103133.